

◎ 朱栋霖 范培松/主编

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/编
ZHONGGUO YASU WENXUE YANJIU

中国 雅俗文学研究

第一辑

东吴之人文学术传统/面向新的百年中国文化史/曹人及其著作述略/幽默散文 以丑为美/论新文学家对现代通俗文学的评价/略论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/身体的诱惑/塑造当代中国的民俗电影

上海三联书店

中国雅俗文学研究

ZHONGGUO YASU WENXUE YANJIU

ISBN 978-7-5426-2578-6



9 787542 625786 >

定价：32.00元

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/编

中国雅俗文学研究

第一辑

朱栋霖 范培松 主 编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雅俗文学研究:第一辑/朱栋霖,范培松主编.

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07.7

ISBN 978—7—5426—2578—6

I. 中... II. ①朱... ②范... III. 文学研究—中国
IV. I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8900 号

中国雅俗文学研究(第一辑)

主 编/朱栋霖 范培松

责任编辑/陈宁宁

装帧设计/张国梁

监 制/李 敏

责任校对/徐曙蕾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: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/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

版 次/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787×1092 1/16

字 数/380 千字

印 张/16.25

印 数/1—4000

ISBN 978—7—5426—2578—6

1·329 定价:32.00 元

新书讯 (一)

教育部「十五」国家级教材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—2000》

总主编 朱栋霖

主教材《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—2000》分上、下两卷，以新的文学观、文学史观系统评述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进程，以人的发现、人的观念的演变重新阐释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。

全书深入简练地评述各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，重新检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，重新评介20年代文学、解放区文学、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，全面新撰20年代文学。各历史时期后附有简要的大事记。

该书注重文学本体的评析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，增加了中外文学比较和文学接受（历来对各经典文本的不同评价），注重反映历来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，有益于开拓视野、活跃大学生思维。

全书学术个性鲜明，见解新颖，思路清晰，资料翔实，体例严谨规范，尤其适合高等学校中文、新闻类专业本科教学。

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。



新书讯 (二)

教育部「十五」国家级教材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—2000》

总主编 朱栋霖

中国现当代文学首部国家级教材《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—2000》, 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该系列教材两种6卷, 总主编

朱栋霖。

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—2000》共四卷。

本书选目, 旨在以新的文学观、文学史观重新遴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。

该书与主教材《中国现代文学史

1917—2000》相配套。

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第一卷 | 小说 (1917-1949) | 张福贵 | 主编 |
| 第二卷 | 诗歌散文戏剧 (1917-1947) | 龙泉明 | 主编 |
| 第三卷 | 小说 (1949-2000) | 吴秀明 | 主编 |
| 第四卷 | 诗歌散文戏剧 (1949-2000) | 汪文瑛 | 主编 |

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出版

学术顾问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王德威 白先勇 李欧梵
杨 义 陈 洪 范伯群
温儒敏

主 编

朱栋霖 范培松

编 委

范培松 曹惠民 朱栋霖 汤哲声
刘祥安 王 尧 陈子平 汪卫东

本丛刊由江苏省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

【卷首语】

东吴之人文学术传统(钱仲联) 1

【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特辑】(一)(栏目主持 朱栋霖)

“国文讲义”与“文学史”之间——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

考论([香港]陈国球) 3

先驱者的启示——纪念黄人《中国文学史》

撰著百周年(王永健) 13

不该被遗忘的“文学史”——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

研究所藏吴梅《中国文学史》(陈平原) 20

面向新的百年来中国文学史

研究的两个问题([日本]斋藤茂) 27

最早的中国文学史: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(黄维梁) 32

明代中后期“花间”词统建构与词体(余 意) 39

魏理眼中的中国诗歌史——一个英国汉学家与他的

中国诗史研究(程章灿) 47

【黄人研究】

黄人评笈(钱仲联) 54

黄人及其著作述略(曹培根) 58

中国近代文学家黄人研究综述(黄钧达) 63

黄人《中国文学史·明人章回小说》考论(龚敏) 72

中国文学史(节录)(黄 人) 81

【散文新观察】(栏目主持 范培松)

幽默散文:以丑为美(孙绍振) 99

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(蔡江珍) 108

一个人与一座城市——赵践散文论(张立新) 119

【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】(栏目主持 汤哲声)

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(韩云波) 128

论新文学家对现代通俗文学的评价(朱志荣) 136

论当代历史小说中的全知视角(蔡爱国) 147

论当代言情小说中的女性第三者(刘玉霞) 155

【名家访谈】

“我们以后的路还很长”

——范伯群先生访谈录(李国平 王木青) 163

【作家作品研究】 (栏目主持 刘祥安)	
文兼雅俗 博通古今——《姚鹤雏文集·小说卷》序(范伯群)	170
鲁迅和非理性主义——《鲁迅全集》第10卷修订一得(徐斯年)	177
潘金莲故事的20世纪版([美]柏右铭著 杨 扬译)	187
【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】 (栏目主持 曹惠民)	
近期台湾文学的“后学”论述(吕正惠)	197
记忆在山海间还原——台湾原住民文学的身份书写(曹惠民)	201
略论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(公 仲 戴瑶琴)	209
【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】 (栏目主持 王 尧)	
《野草》:寓言式的废墟([美]王 斑著 孟祥春译)	216
革命加恋爱的幻象([美]刘剑梅著 郭冰茹译)	225
身体的诱惑:塑造当代中国的民俗电影([美]张英进著 胡 静译)	233
【新锐视野】 (栏目主持 陈子平)	
残酷与温情——从《活着》看余华小说风格的转变(马 潇)	241
阅读米兰·昆德拉——小说和电影的对视(王晶晶)	247
人生,永远寂寞——读《〈呐喊〉自序》有感,兼论鲁迅小说的构思原型(聂剑平)	255
【书评】	
史家的襟怀 论家的深刻——评范伯群等著《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》(王木青)	258
稿约	260

东吴之人文学术传统

钱仲联

国内外声名洋溢之上痒，无不具有源远流长之文化学术传统。域外如牛津、剑桥，禹域如北大、清华皆是也，苏州大学，今日矗立于东南之上痒也，其前身之大学非一，而东吴大学建校为最先。远在曼殊朝光绪辛丑前，即已建立，辛丑岁即正名为东吴大学堂。为余降生前八载，迄今约百年矣。苏大文学院今日之成就辉煌，生海先河，溯源自当上及东吴建校之初矣。

东吴建校，即聘我乡黄摩西为文学总教习，犹今世之主任也。与摩西同时任教者，余杭章炳麟太炎、吴县吴梅瞿安、常熟金叔远鹤冲，俱当时学林巨子，各有不朽之著述传世。

黄人，原名振元，中岁改名人，慕韩、摩西其字，辛亥革命后，忧时发狂疾逝。吴梅称其于学无所不窥。凡经史、诗文、方技、音律、遁甲之属，辄能晓其大概，故其为文，操笔立就，不屑于绳尺，而光焰万丈，自不可遏云云。吴江金天羽撰《苏州五奇人传》，奉摩西为魁首焉。所著《中国文学史》，煌煌三十巨册（常见之排印本为二十九册，苏大图书馆珍藏有后发现者一册）。乃摩西在校为诸生讲操之讲义，随编随印，时间迫促，则同事金叔远助之勘对引书并助之书写，至宣统元年前后，大体完成，为我国巨型文学史著作之先驱。其书金叔远以为从文字肇始，以至极盛时代、华离时代，无所不详，其中爱国精神之表著，特为炽烈，以为国有语言文字，此其国必不劣；吾国之文学精微浩瀚，外人骤难窥其底蕴，故不至如矿产路权遁加剥夺，如媚外而不知自爱，则不待人之灭我而我行将自灭也。书中又昌言言论思想之自由，漉糟粕而出精华，阐述文学与真、美、善之关系，发展变化与世运迁移之关系，宣扬小说与杂剧之重要意义与地位，同时之文学史，罕有见及此者。盖一书之意蕴，史学、哲学、美学胥寓焉。摩西又创办《小说林》，撰《小说小话》，为操倡通俗文学之实践。其自为诗词，有《石陶梨烟室诗》、《摩西词》，拓胡天游、龚自珍之异境而叹之，鬼出电入，石破天惊，挾清末同光体及词苑王鹏运、郑文焯、朱祖谋、况周颐四大家之樊篱而破之，摩西自题其集云：“安得美人都化月，山河留影无生灭。”盖自知者明焉。

章炳麟为清末汉学家古文学派大师，黄人与之共事，不徒服其博学，且同怀革

命豪情。至于文学,章、黄所见,并不契合。章氏为清廷搜捕,摩西匿之于校外私人寓室,并护之乘火车赴沪避祸,交谊之笃,可以风世。章氏学术,世多论述:无待余之饶舌矣。

吴梅,籍本苏州,以曲学名高一世,与王国维氏齐驱。摩西与之交深,引入东吴讲座。吴氏所著《风洞山传奇》,虚构明末义士反清故事,寄寓反清复汉之怀,有足多者。

金叔远鹤冲,黄人同乡挚友,既助黄完成《中国文学史》,又编《钱牧斋先生年谱》,专为牧斋先生反清志业,表微阐隐,盖亦托古以见志者。

由上可知,当时诸先生群集东吴讲舍,极一时之盛,合志同方,营道同本,盖有越于人文学领域之外者矣。

在诸先生之后二三十年,长期任东吴中文系主任者为凌景埏先生。先生雅好度曲,尤精散曲,著《金清散曲》一书,开近世治散曲蔚然成风之先声。中国雅文学与避俗文学,合为一家,先生能之,东吴之人文学术传统至是开婪尾之花焉。

余生也晚,后于东吴之创建已八载,早期讲学诸贤,仅金先生叔远,在虞乡时,常奉手,因得备闻当日掌故。今则早中期诸先生俱已谢世,使余不胜惘惘之感矣。

(本文系已故国学大师钱仲联教授生前为《中国雅俗文学》
刊印所撰专稿,时为1998年。)

编者按:

1904年,京师大学堂林传甲、东吴大学黄人各自撰写的中国首部《中国文学史》同时问世,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。百年来,中国文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。2004年11月,北京大学中文系、苏州大学文学院假东吴大学旧址,联袂召开“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”,海内外学术名家二百余人莅会发表论文。

今征得同意遴选部分论文,分两期特辑发表。

“国文讲义”与“文学史”之间

——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考论

陈国球

摘要:长久以来,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被视为“第一本中国文学史”,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的规限写成的“标准教科书”,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笹川种郎《中国文学史》而有所不及。这些观点虽然各有其根据,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。本文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,发现这本“中国文学史”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,与日本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关系亦不深;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“国文讲义”,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。

关键词: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 京师大学堂章程 国文讲义 笹川种郎

中国现代形式的“文学史”书写,约在一百年前出现。经过一个世纪的操演锻炼,至今“文学史”书写已变成一项极为陈熟的作业方式,在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走进走出。然而,今天我们再回顾一百年前“中国文学史”的起动机缘,会发现无论是当天的撰述还是日后的批评,都存在种种错觉和误会。以下我们就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作一考析,试图澄清过去一些误解。

一、林著被视为“第一本中国文学史”的原因

“中国文学史”的撰述,由外国学者草创,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至于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“中国文学史”究竟是谁人所写、什么时候面世的?早期大家都以为是林传甲(1877-1921)为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学生所编,完成于1904年(光绪三十年)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近年有不少

学者又有不少新的看法,或则以为是黄人(1866-1913)为东吴大学教习时编写的百万言巨著,或则以为是窦警凡出版于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的《历朝文学史》。^①

其实这个问题早在“中国文学史”书写活动的第一个高峰期——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就已经是一个常见的话题。譬如胡怀琛《中国文学史概要》(1931)、胡云翼《新著中国文学史》(1932)、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(1932)、张长弓《中国文学史新编》(1935)、容肇祖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(1935),都提到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是国人所著的最早一本文学史。^②

针对这种看法,孙景尧先生指出,“学界常提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是开山之作,而黄人写的同类巨著,却被冷落一旁”;之所以有这种“厚此薄彼”的现象,原因是林著虽“贗”而合乎学界的“时好”,黄著虽“真”却与时尚不同;而“时好”又是源于“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”,后来演成“一尊定局的中国文学史认识”。^③

其实,这个推断与事实之间有很大落差。我们在此可以稍作分解。首先我们要知道,窦警凡的《历朝文学史》虽说脱稿什早,有指出是1897年(光绪二十三年)写成,1906年铅印刊行,但出版后似乎流通不广。黄人之撰写文学史,始于1904年,初稿大概完成于1907年,国学扶轮社印行本则不早于1911年(宣统二年)。由于这部《中国文学史》是170余万字、凡三十册的大部头著作;其流通的范围亦很局限。

至于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最初是作为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”而撰写的。当时京师大学堂的“分科大学”尚未成立,^④只有“豫备科”,附设“仕学馆”和“师范馆”,后来“师范馆”改成“优级师范科”。^⑤林传甲由同乡严复推荐为大学堂教习,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就任,在“优级师范科”负责国文教学;并按规定编写讲义,同年12月完成。

这份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”在大学堂内流通的版式暂时未能考知,据陈玉堂记载,应有1904年和1906年的印本,可能已经流传到大学堂之外。及至1910年,《广益丛报》开始连载这份讲义,到1911年刊完。1910年武林谋新室刊行“校正再版”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到1914年已印六版。同年又有广州存珍阁版,封面标题作《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》。^⑥又据郑振铎1922年在《文学旬刊》发表的《我的一个要求》文中所记(详后),林传甲之作还有“奎垣学校发行”的版本。估计当时全国各地争刊此书的书店不少。

由此观之,挟着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”之名的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流播非常广远,比黄人或者窦警凡的“文学史”更为人所知,因此很容易被视作国人所撰的“第一部中国文学史”。只不过大家对林著的重视,不必如孙景尧先生所讲的:因为这本《中国文学史》合乎学界的“时好”,而“时好”就是“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”。事实上,几乎所有提及林传甲之作的论者,都没有表示赞赏;反之,他们大都以这本著作作为批评的对象。这个看法早见于郑振铎在1922年9月发表《我的一个要求》;文中评论所见九本“中国文学史”,对林传甲之作的的评价是:

名目虽是“中国文学史”,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!有人说,他都是钞《四库提要》上的话,其实,他是最奇怪——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,他也不曾懂得呢!^⑦

其它在二三十年代的论评对林传甲之书的看法,基本上也都是负面的。因此所谓“时好”,与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的关系似乎是“对立”还多于“相生”。至于林著与“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”的关系,也不十分密切。这一点下文会有补充解释。我们想要指出的是,前人举出林著而不提黄、窦之作,原因是所见未及,而不在评价的高下抑扬。

二、林著不是紧跟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而编的教科书

林传甲上任的一年，即光绪三十年，京师大学堂有一份《详细规则》颁布，规定“教习”要在上课前一星期（至迟五日前）将讲义送教务提调察核；每学期毕（至迟十日）又要将期内所授功课作一授业报告书，送教务提调察核。^⑧五月，林传甲入京师大学堂任“优级师范科”国文教习，马上要赶编讲义。他边教边写，“奋笔疾书，日率千数百字”，同年12月学期完结之前共写成16篇，并以这份讲义为学期“授业报告书”呈交教务提调。^⑨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。由于这部“最早”的文学史本是林传甲为了在“京师大学堂”教学而编写的，而我们翻查对照1904年颁布的《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，会发现其篇目全抄自《章程》中的“研究文学要义”各款，因此我们很容易会判断林传甲是紧紧跟着“教学大纲”来编“教科书”，而《中国文学史》就是早期“中国文学史”课的一本标准教科书。其实这个看法也不大准确。

原来《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的“研究文学要义”共有四十一款，本是“文学科大学”的“中国文学门”（相当于现今学制的文学院中的中文系）其中一门课——“文学研究法”的教学纲领。然而，林传甲的“讲义”却不是为这门课而撰写的。林传甲上任时，“分科大学”——包括“文学科大学”——尚未成立。林传甲就任的是依《优级师范学堂章程》而附设于大学堂的“优级师范科”。

按照《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》，此科的课程共有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“公共科”，学生在未“分类”（即分科学习）以前共同修习，一年毕业。课程共有八科，其中包括“中国文学”一科，章程的说明是：“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，间亦练习各体文。”

第二阶段：“分类科”，共分四类：第一类以中国文学、外国语为主；第二类以地理、历史为主；第三类以算学、物理学为主；第四类以植物、动物、矿物、生理学为主；三年毕业。四类的课程都包括有“中国文学”一科，章程对三年所习的“中国文学”科的说明都一样：“练习各体文”。

第三阶段：“加习科”，供“分类科”毕业生自愿留习一年，深造教育理法。^⑩

林传甲要教的是第二阶段的“分类科”课程的“中国文学”科，按章程他只需要指导学生“练习各体文”，应该都是比较轻松悠闲的。但他发觉班上学生，根本没有上过第一阶段的“中国文学”课。于是他以半年的时间，为“分类科”学生补讲“公共科”一年的“中国文学课程”——“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，间亦练习各体文”。^⑪林传甲说：

今“优级师范馆”及大学堂“预备科”章程，于“公共课”则讲“历代源流义法”，于“分类科”则“练习各体文字”。惟教员之教授法，均未详言。查《大学堂章程》“中国文学专门科目”，所列“研究文学众义”，大端毕备。即取以为讲义目次，又采诸科关系“文学”者为子目，总为四十有一篇。每篇析之为十数章，每篇三千余言，甄择往训，附以鄙意，以资讲习。^⑫

以上详细交代林传甲实际教学需求和具体目标，目的在于揭示他的“国文讲义”是何等芜杂不纯的材料总汇。我们要注意的有几点：

第一，按章程他要教的是“分类科”学生“练习各体文”，但他要追补学生本应在“公共科”阶段学习的“历代文章源流义法，间亦练习各体文”的课程。

第二，因为章程没有说明“优级师范科”的教法，他就“越级”取资于“文科大学”中的“中国文学门”的说明。

第三,他取材并不专据“历代文章流别”一科,大概因为《大学堂章程》有关这一科的说明太简略,只有一句:“日本有《中国文学史》,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。”他只好到处张罗;先借用“文学研究法”的四十一项说明作大纲,再掺杂其它科“关系文学者”,作为子目,凑成一部讲义。

第四,这个“四十一篇”的初步构想,到后来大概因为教学课时所限,也可能是教学过程中发觉难以完全发挥,于是顺着次序编到“研究要义”的第十六项就告一段落;完稿时还得自圆其说:

大学堂讲义,原系四十一款,兹已撰定十六款。其余二十五款,所举纲要,已略见于各篇,故不再赘。^⑩

第五,林传甲也没有忘记《大学堂章程》“历代文章流别”的指示,于是他就在开卷时声明:

传甲斯编,将仿日本笹川种郎《中国文学史》之意,以成书焉。^⑪

事实上,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的“研究文学要义”,与日本《中国文学史》根本是两回事;目标不同,要求不同。林传甲如何结合、能否成功结合“研究文学要义”与日本“文学史”之意,将在下一节讨论。于此,我们想指出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并不是一部标准的“中国文学史”或者“历代文章流别”课的教科书。

笔者曾经分析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“中国文学门”的设计,认为这是一个形式上相当工整匀称的架构,具备现代“学科”的规模。虽然就“文学”定义的内容来看,其观念还是不离传统“词章”之学;但规划方式却有现代意义:论文学的本体有“周秦至今文章名家”,从历时角度讨论文学的有“历代文章流别”,从作品于读者的接受层面着眼的有“古人论文要言”;周边的支援科目有“说文学”、“音韵

学”、“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”、“四库集部提要”、“西国文学史”等。^⑫“研究文学要义”是总纲科目“文学研究法”的说明,其范围当然广及整个课程的各个环节;这四十一款的说明与“历代文章流别”或者“中国文学史”根本广狭有别,重点不同。林传甲为了讲授“优级师范科”的课程,顺手借用另一级别、另一科目的课程说明头十六款,其效果当然会超出《奏定章程》原来的设计。

三、林著没有“仿日本笹川种郎《中国文学史》之意”

《中国文学史》在开卷部分说明:“传甲斯编,将仿日本笹川种郎《中国文学史》之意,以成书焉。”复检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的“历代文章流别”一课的说明,也说:“日本有《中国文学史》,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。”大家都会推想林传甲的讲义一定与日本明治三十一年(1898)出版,笹川种郎撰写的《支那文学史》有很密切的关系。这个想法也可以说是错误的。

笹川种郎的《支那文学史》分九期论述“春秋以前的文学”到“清朝文学”。其特色有两点:一、从地域人种风俗的殊相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色,二、以“想象”、“优美”等概念论述文学。^⑬前者源自欧洲的“国族”思想,尤其丹纳《英国文学史》(Hippolyte Taine,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, 1864)的“人种、环境、时代”的分析架构;后者也是从西方输入的现代“文学”规范。

笹川种郎的《支那文学史》出版后,很快就传到中国。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(1904年1月),也就是《奏定章程》颁行的同时,上海中西书局把这本书翻译,改题《历朝文学史》印行。林传甲固然有可能看过这个翻译本,但他对日本资料似乎很熟悉,他说“仿其意”之所本,应该是指日文的《支那文学史》。不过,林传甲究竟掌握了几多笹川之“意”,实

在值得怀疑。除了主张“师其意”等比较概括抽象的说法之外,在他的“讲义”的细节讨论中,共引述笹川三次,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第十四篇批评笹川《文学史》之重视元代小说戏曲,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再作专论。

林传甲另外在“讲义”第九篇《周秦诸子文体》两次提到笹川《支那文学史》:一是论庄子,另一是论韩非子。对照笹川原书,可见《支那文学史》在这两个地方的讨论都能配合全书的宗旨,以南北人种之说立论;例如说庄子与孟子分别绍述南方老子与北方孔子的精神,韩非子的文学是南北合流的表现。^⑩笹川又能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各家的思想文辞,赢得现代学者的赞赏。^⑪

林传甲虽然引述笹川的论点,但他自己的观察点却完全不同。论韩非子“创刑律之文体”,重点在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。论庄子文辞时提及孟子,但依林传甲的体例,两者更重要的分野在孟子属“经部”,而庄子入“子部”。^⑫我们又可以参看林传甲一次颇为得意的辨体——认为屈原《楚辞》之体应入“子部”。他的根据是:一、屈原可与老子、庄子并列,但老子和庄子之文,都不入“集部”;二、《史记》中屈原与贾谊同传,而贾谊《新书》亦列子书;三、《楚辞》不能列于“经部”,因为未经孔子删定。^⑬由此看来,林传甲考虑的似乎是学术的分野,和现今大家体认的“文学”,相距什远。

《中国文学史》由第七篇到第十六篇,先是经、子、史等体的辨识;然后是集部的历朝各体、骈散分合等的体认。这种辨体工夫,目光主要放在各种文体的功能,例如说“《周髀》创天文志历志之体”、“《神农》《本草》创植物教科书文体”、“《孙子》创兵家测量火攻诸文体”、“《老子》创哲学家卫生家之文体”。因为立足点在区别功能的异同,所以林传甲之论是“并时”(synchronic)意味的分析描述;他并没有探究“历时”(diachronic)轨迹上的变化承传。因此,林传甲与笹川二人的论述

倾向,明显不同。

再者,我们还留意到林传甲在《周秦诸子文体》一篇,共引述日本小宫山绥介《孙子讲义》三次,大田才次郎《庄子讲义》一次,远藤隆吉《中国哲学史》三次。^⑭由林传甲的论述看来,他对诸子“学”的兴趣,远远大于诸子“文”。这与笹川以“文学”为论说基点的态度相比较,更显出二人的文学观距离极远。

四、林著之所以鄙视小说戏曲小说

笹川种郎的《支那文学史》很重视小说戏曲等向来为中国传统论述所轻视的文学体裁,此一观点当然与日本当时的“现代”文学观有关,并非笹川所独有。然而,林传甲在他的《文学史》中却对此大力批评,以为“识见污下”:

日本笹川氏撰《中国文学史》,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,悉数录之。不知杂剧、院本、传奇之作,不足比于古之《虞初》,若载之风俗史犹可。〔自注:坂本健一有《日本风俗史》,余亦欲萃“中国风俗史”,别为一史。〕笹川载于《中国文学史》,彼亦自乱其例耳。况其胪列小说戏曲,滥及明之汤若士、近世之金圣叹,可见其识见污下,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。^⑮

今天论者却往往有相反的判断,他们把林传甲之说与笹川《文学史》的论述并比相较,指出林传甲的落伍和保守。^⑯这个论断不能说不对,事实上当时戏曲小说在民间已非常通行,也开始有知识分子从社会功能角度去称颂小说,林传甲似乎仍守着老旧的教条,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。但在批判之余,似乎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查看林传甲立论的背景。

笔者曾经仔细翻查当时京师大学堂的规章,注意到《奏定学堂章程》的众多文件中包括一份《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》,当中“学堂禁令章第九”有一则规定: